

捍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



河南省文联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捍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

河南省文联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8·郑州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對河南省文藝界右派分子蘇金傘、樂星等七人的批判的文章的結集，全書共收集了21篇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概括地介紹了河南文藝界反擊右派鬥爭的概況；徹底地揭發了右派分子蘇金傘等反黨、反社會主義文藝路線的罪惡活動，有力地駁斥了他們的荒謬言論；同時對於文藝如何為革命的政治服務，如何為工農羣眾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以及如何無條件地接受黨的領導，也作了清楚的分析。對於廣大文藝作者和愛好者，在學習文藝寫作中，如何貫徹黨的社會主義文藝路線，堅持正確的寫作方向，提供了明確的借鑒。

捍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

河南省文聯編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總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號：879

787×1092 1/32 · 印張 · 120,000字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88冊

統一書號：10105·163

定價：（7）0.36元

前 言

自去年六月以來，我省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發動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進攻，展開了劇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河南文藝界揭露出一個以蘇金傘為首的右派集團，揭發了他們的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收集在這個集子里的，便是河南文藝界為了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對右派分子蘇金傘、樊星、王大海、錢繼揚、李白鳳、馬長風、李晴等七人的一部分批判的文章。

這個集子共收集了21篇文章，是從去年六月我省開展反右派鬥爭以來，迄至目前為止的這個時期內，在“河南日報”及“奔流”文學月刊上所發表的文章中選輯的。這些文章以擺事實講道理的精神，對右派分子的罪惡活動進行了有力的揭發，對他們的顛倒黑白的荒謬言論，作了有力的駁斥和批判，對於在文藝問題上如何辨明大是大非，也作了清楚的分析。

右派分子對黨的社會主義文藝路線進攻的矛頭，主要集中在這樣兩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上：文藝應當為廣大工農羣眾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呢；還是只作為個人的或少數人的事業，只為滿足個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藝工作者應當無條件地接受黨的領導呢；還是拒絕或者削弱這種領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領導文藝是切齒痛恨的，他們反對黨領導文藝，就是要使文藝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使文藝成為給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蘇金傘等右派分子也和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樣，正懷有這種險惡的居心。這裡面的文章圍繞着這兩個問題和右派分子展開辯論，對他們進行了嚴正的駁斥和批判。

由於我們占有的材料不夠完全，又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所選的文章，只是重點地針對着那些較早地揭發出來的，及罪惡活動比較顯著的幾個右派分子進行了揭發和批判，對省內文藝界其他右派分子及右派言論的批判，擬另輯專集。我們希望通過這重點的批判，能為讀者介紹一下我省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梗概；在辨清文藝問題的大是大非，維護黨

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中，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这个集子还很不完备，而斗争仍在继续深入着，我们希望能够听到读者的意见，以便在今后继续编选这方面文集时，有所改进。

河南省文联

1958.1

目 次

- 把文藝思想上的大辯論認真地开展起來……………杜希唐(1)
- 為培養工人階級的文藝隊伍，
建設社會主義的文藝而鬥爭……………杜希唐(7)
- 右派分子蘇金傘的眞面目……………賀力震(18)
- 蘇金傘的反動文藝思想……………牛星斗(30)
- 蘇金傘怎樣篡改“奔流”的政治方向……………余 昂(38)
- 駁蘇金傘等“黨不能領導文藝”的謬論……………牛星斗(44)
- 清除“人性論”在文學創作上的流毒……………李 准(49)
- 文藝一定要為革命的政治服務……………余 昂(53)
- 把民歌快板的創作引導到哪裡去……………任 毅(57)
- 剝去右派分子樂星的外衣……………李准 克西等(62)
- 樂星的三支毒箭……………杜希唐(71)
- 從“不要堵人家的嘴”的發言看樂星的反動謬論……………牛星斗(76)
- 所謂“詩人”李白鳳原是右派分子……………江 濤(81)
- 且看這只“狼”……………林 召(85)
- 略論李白鳳的詩和詩論以及其它……………鄭克西(88)
- 披著羊皮的豺狼……………李長俊(96)
- 駁錢繼揚的兩篇“編者的話”……………嘉 季(104)
- “題材雜談”談的什麼……………張有德(110)
- 馬長風、李晴反黨小集團的復滅……………余 昂(115)
- 馬長風的“靈魂”……………李 准(119)
- 右派分子李晴的眞面目……………鄭藍云(121)

把文藝思想上的大辯論

認真地開展起來

杜希唐

最近三個月來，我省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之下，對文藝界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展了嚴肅的鬥爭。蘇金傘、樂星、馬長風、李晴、李蔚、安瀾、平東、李白鳳等這些黨內外文藝界的敗類的丑惡面貌，已經暴露在廣大羣眾的面前。黨內外的許多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青年作者，都在鬥爭會上講了話，或者寫了揭露批判他們的文章，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極為生動的、深刻的階級教育。這些右派分子，已經在羣眾中開始孤立起來，他們囂張的反動氣焰，已經被打垮，社會主義的文藝路線，已經深入到廣大的文藝工作者當中去，這就說明，我省文藝界反右派的鬥爭，已經取得了一個重大的勝利。但是，應該認識到，這只是初步的勝利，直到現在，文藝界的右派分子，並沒有徹底交械，蘇金傘右派小集團中的分子，還沒有站出來對他們的小集團的陰謀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深藏的右派分子還沒有被挖掘出來，一些被右派分子所蔽蔽的人，還不清楚我們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何在，他們還在猶疑觀望，表示沉默。因此，我們必須把我省文藝界反右派的鬥爭再進一步，把文藝思想上的大辯論認真地開展起來。

我們和我省文藝界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何在呢？分歧在於，文藝要不要為革命的政治服務？要不要黨的領導？我們的答復是肯定的，但文藝界右派分子的答復則恰相反。這是文藝工作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鬥爭，在全省來說，是由來已久的，特別自第一次省文代會以來，從沒有間斷過。當然，文藝界的右派分子，不要文藝為革命的政治服務，不要黨的領導，並不是直然提出的，他們是採取了轉彎抹角

的、比較隱晦的辦法提出的，比方，蘇金傘在省第一次文代會上說：“我們要給創作以廣闊的領域，不必要求一定在每一篇作品里，包含着什麼政治目的。”不包含一個政治目的，那末，蘇金傘要文藝達到什麼目的呢？這就是他經常強調的：“文藝作品應該潛移默化地影響人，文藝也應該有個文化休息的作用。”這就很明顯了。蘇金傘不要為政治服務，其實，他正是要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不過，他所說的文藝，不是我們所要發展的社會主義文藝，他所要服務的政治，不是我們的革命的政治，而是資本主義的文藝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是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以自己的作品，影響、動員和鼓舞千千萬萬的工農兵（包括革命知識分子）廣大勞動羣眾，以忘我的勞動從事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磚一木地共同築起美好的社會主義大廈，因此，文藝工作者應該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常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羣眾，經常深入工農兵羣眾，同工農兵羣眾相結合，全心全意地為工農兵羣眾服務。這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告訴我們的：“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羣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我們大家都知道，建設社會主義，是羣眾性的偉大的工程，同時也是艱苦的工程。在建設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是要經過和國內外敵人的破壞活動和人民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作錯綜複雜的鬥爭的，是要經過兩條道路的鬥爭的。在這個火熱的鬥爭當中，有一種文藝工作者，如蘇金傘他們，不是要文藝作品鼓舞人民去積極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而是要人民去作“文化休息”，不是要文藝工作者去深入工農兵，去寫工農兵的勞動，給工農兵看，而是標榜什麼“給創作以廣闊的領域”，“不必包含一個什麼政治目的”，這不正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嗎？他的政治目的，揭穿來說，就是文藝作品不必寫工農兵的勞動，不必給廣大的工農兵看，不必為勞動人民服務，也就是不必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因此，作者也不必深入工農兵，同工農兵相結合。他們要寫什麼呢？要寫工農兵以外的人。工農兵以外的還有哪些人呢？那自然是那些少數的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了。作品要為這樣少數人服務，自然就得強調藝術標準，要“藝術至上”，要文化達到休息娛樂的目的，就得強調“為藝術而藝術”，就不能強調政治標準，更不能強調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样就可以达到文艺不是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情绪，而是涣散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情绪的目的，不是要作者深入工农兵，而是告诉作者到处有生活，不是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只提倡现实主义。这，我们能说他是没有政治目的的吗？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吗？完全不是。他不过是如此标榜，借以迷惑人而已。他的政治目的很明显，是要推迟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必须予以揭穿的。是的，在省第一次文代会上，曾有许多同志给他揭穿了，但是，他并没有信服。

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日报”上发表后，对于当时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于进行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起到了好的影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为党的领导所重视，但作为省文联副主任的苏金伞，对这篇小說，却采取了贵族老爺式的輕蔑态度，不加評論，以表示和他的文艺思想不相符合。在报社約稿，要他寫推荐文章的情势下，不得已才寫了一篇非出自真心的表示基本肯定的文章，但在“河南日报”轉載了“長江文艺”上于黑丁同志的热情肯定“不能走那条路”的文章以后，苏金伞的假面具帶不牢了，他要“河南文艺”轉載了“文艺报”上李琮的錯誤的評論文章，并加上錯誤的按語，又把“不能走那条路”的小說加以否定，頑固地表现出他的“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的文艺观点。后来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关于“不能走那条路”的座談会上，苏金伞采取了兩面派的手法，作了“不是首先視其政治效果，而是过多地从藝術上來要求”的似是而非的所謂檢討，但在大鳴大放期間，在“文艺报”上發表的“肅清文学上的宗派主义”一文中，把这点也翻了案了。

苏金伞和我省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还借口“創作自由”、“題材廣泛”、“独特風格”、“干預生活”、“寫真实”、“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宗派主义”、“党不懂文艺”、“歷來偉大作家是反现实的”等等，來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來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方法。

誰都知道，在我們現在的社会里，文艺工作者，只要他們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寫作，比起旧社会來，有不可比拟的最大的自由。革命的作者，在題材選擇上，在表現方法上，在藝術風格上，都有充分的自由，

誰也沒有給予什麼限制。但是，他們還嫌不自由。他們到底要的是什麼自由呢？他們要的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自由。以蘇金傘為例，在大鳴大放期間，一些右派分子，以幫助黨整風為借口，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行了猖狂的進攻，弄得滿天烏雲，那時，他們提出，只准他們自由地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進行謾罵、造謠和污蔑，只准他們自由地到處煽動點火，不准黨和人民進行還擊和救火，在這個時候，蘇金傘從蒙古回來，即在“文藝報”上發表文章說：“我感到我的祖國是在陽光絢爛，萬紫千紅，百鳥聲喧的春天里，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幸福。”只有在人民利益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他才感到“幸福”，他所要求的自由，不是很明顯的嗎？這樣的自由能不能給他呢？不能的，給他們這樣的自由，就是讓他自由地製造匈牙利事件。這種別有用心的人，感到沒有創作自由，原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和我們是兩條心。

“干預生活”的口號，是提得不恰當的。我們主張的是深入生活，不是什麼“干預生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羣眾中去”，參加勞動，作具體工作，這是創作的唯一的源泉。但是，這個口號被右派分子解釋為“干預生活”，就是揭露社會生活的黑暗面”，就更不妥當了。蘇金傘說：“在揭露社會矛盾時，要深刻，更要大膽，我們要有與坏人坏事以及不合理現象作鬥爭的勇氣，也就是說，我們要敢大膽地干預生活。”在我們現在的社會里，有沒有坏人坏事呢？有的。如流氓、阿飛、貪污、盜竊等各種各樣的坏人坏事都還有，雖然這不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主要方面。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主要方面，是與日俱增的具有勤勞勇敢、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人和事，是大量涌現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等等先進人物和模範事迹。但是，舊社會遺留下的少數的渣滓，還是存在的。為了肅清這些坏人坏事，當然是可以大膽揭露，並引導人民向他們作勇敢的鬥爭的。我們新社會里有沒有不合理現象呢？也是有的。現在還有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要少勞多得，甚至要不勞而獲，偷偷干些損人利己的事，為了肅清這種剝削階級的思想，對他們當然可以作大量的揭露。但是，蘇金傘指的不是這個，他指的是幹部中的官僚主義等三個主義，他說：“這就是我們目前需要大力反對、大量揭發的三種壞傾向……生活中不缺

乏这样的题材，我們要深入地廣泛地揭發出來。”当然，这三个坏主义是要揭發的，工作中的困难、缺点和錯誤，也是可以寫出批評的。問題是在于出于什么动机？在于怎么寫？寫出这些，又寫出怎么克服，顯示出我們工作的成績还是主要的，缺点和錯誤是次要的。当然最后失败了的事情，也可以寫，寫出其中的教訓，对人們是一种教育。如果不是这样，只是“为暴露而暴露”，甚至不惜誇大、捏造事实，制造“今不如昔”的气氛，引人反党、反现实，那便是右派分子在施放烟幕了，我們一定要反对这样的“干預生活”。

文藝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标榜“寫真实”，“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歷來大作家都是反现实的”，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方法。我們也主張“寫真实”，因为藝術作品，当然要真实，但是我們寫真实的目的和他們完全不同，他們“寫真实”的目的，是要使文学不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是要使文学寫“黑暗面”，模糊人民的階級意識，便于煽動人們反现实。他們还說：社会主义文学不真实，是說假話。比如，苏金伞說：“实际情况却是：有一些資本家却非常喜欢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是敲鑼打鼓地慶賀这一改造的成功；有些中農非常坚决参加高級社，甚至比貧農还坚决；而有些貧農却反而不願参加。……有些性格，可能各个階級所共有，比如怯懦自私，固然資產階級存在着，但有些貧農也并不是沒有这样的人，就是工人階級也不見得沒有。忠真正直，固然是工人階級的本色，但別的階級也不見得沒有这样的人。”苏金伞这样煞費苦心地标榜“寫真实”，把个别事物当作整体，把事物的某些現象当作本質，其目的，不是企圖証明資本家比工人階級，中農比貧農还进步，从而挑起資本家不去誠懇地接受改造，和中農的不滿现实嗎？不是企圖証明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方法寫出來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嗎？文藝界右派分子更進一步引導文藝工作者尋找社会生活中的“黑暗面”來寫作，制造“歷來大作家都是反现实”的荒謬輿論，模糊作者的階級意識，忘掉今天是什么社会，提倡名利，把青年作者引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他們的用心是多么的險惡啊！

右派分子強調“藝術特征”，強調“形象思維”，強調“藝術高于政治”，強調“党不懂文藝”，因而企圖排斥和擺脫党对文藝工作的領

導，要黨不要干涉文藝，使他們所在的單位成為獨立王國。他們是高于一切的人，他們要指揮一切，黨如果去干涉，那就是黨有“宗派主義”，黨不給他們創作自由，使一些作者和黨离心离德，以達他們篡奪黨對文藝事業領導權的目的。

幾年來，我們和這些右派分子作過不間斷的鬥爭，宣傳了黨的文藝方針路綫，培養了不少革命的文藝作者，產生了不少好的作品，但我們對於右派分子的這些反動的文藝思想，缺乏系統的批判，因而還有不少的文藝青年受到他們的蒙蔽和毒害，也寫出一些不利于黨、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會主義的壞作品，使香花沒有更多地開放，却使毒草得到了蔓延，把一些不堅定的、個人主義包袱沉重的文藝青年拖到了右派的泥坑，或者拖到了危險邊沿。這雖然要由這些文藝青年自己負責，但也是我們的一個嚴重的教訓，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地把潛藏在各個角落的文藝界右派分子，全部挖掘出來，一個不漏，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直至他們徹底交械為止；並且認真地開展文藝思想上的大辯論，洗滌右派分子所散布的一切毒素，分清是非，堅定地團結在黨的周圍，解除個人主義的包袱，全心全意地為工農兵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然在辯論中，應該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文藝上的自由競賽的原則，防止粗暴和簡單化的作法。作者必須生活在工農兵當中，和工農兵羣眾打成一片。毛主席指示我們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讓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去，取得豐富的藝術感受，寫出更好的為羣眾所喜愛的文藝作品來。

1957.9.24

为培养工人階級的文藝隊伍， 建設社会主义的文藝而斗争

杜希唐

苏金伞右派集团的陰謀活动

河南省文联四个多月來，开展了反击以苏金伞为首的右派集团的斗争。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員，是苏金伞、欒星（黨員）、錢繼揚、王大海等九人。这一場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藝路綫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藝路綫的斗争，是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藝路綫和维护河南文藝界的团結的斗争，同时也是为建立、健全、改造和鍛煉河南社会主义文藝隊伍的斗争。現在，这个斗争已經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右派集团已經土崩瓦解，右派集团的許多成員紛紛交械投降，他們的陰謀完全敗露；被这个右派集团拖到右派泥坑边沿的人員也作了揭發和控訴；党内外羣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鍛煉，和右派集团在政治上、思想上初步划清了界限，省文联內文藝工作者下鄉上山到羣众中去鍛煉的空气空前高涨起來。

河南文藝界苏金伞为首的右派集团，其主要成員在解放以前就已形成为一个帶有封建行帮性質的资本主义“同仁社团”。那时候李薏（趙悔深）还在河南。欒星、錢繼揚等在洛陽于一九四三年糾集了一伙國民黨黨員、三青团員、旧軍官、特务、叛徒等組織起文藝团体“音社”，出版“音社文藝叢書”，拉李薏、苏金伞作为“大旗”。或明或暗地为國民黨反动派出力报效。这个集团的成員曾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冲散，在日本投降以后，又紛紛回到河南。那时李薏从南陽“前鋒报”到开封“中國时报、前鋒报联合版”工作，苏金伞在开封教書，兼編“中國时报、前鋒报联合版”副刊，从此又重新团聚，各自主持着一个副刊，

在特务报纸和对国民党反动派“小幫大帮忙”的所謂“民办报纸”上发表文章，互通声气，互换副刊單頁，互相捧場，在日文壇的宗派思想支配下，联合起來为他們小集团“打天下”，追求个人的發展，与党的文藝思想背道而馳。解放后，李荏、苏金伞采用了兩面派的手法，騙取了党對他們的信任，接受党的委托筹备河南省文联。这时，他們利用了当时人事制度不健全和个别領導人的嚴重的官僚主义作風，从四面八方又把他們小集团中的人物搜羅過來，安置在省文联內各部的領導的崗位上。从此，这个右派集团便完全把持了省文联的領導权。对党陽奉陰違，抗拒党的領導，反对党的文藝方針，宣揚胡風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把省文联这一个党用來联系文藝工作者的羣众組織，变成為他們少数野心家所独占的爭求名利的“同仁机关”，干出一系列的罪惡活动。

在鎮反运动中，以李荏、苏金伞为首的反动集团，千方百計地包庇了这个集团內外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暗示他們拒不交代他們罪惡的歷史和活动，反過來以“×××同志不了解國統区的情况”为借口，煽动对党员不滿的情緒，使集团成員更加靠攏和囂張。

在“三反”前后，他們的反动活动达到了頂峯。在“三反”运动中，他們把当时省文联內唯一的党员×××同志視作眼中釘，企圖把他赶走，并且要把他的党籍搞掉。他們硬逼着×××同志承認自己是“山头主义”，污蔑×××同志有包庇×××同志的錯誤。但由于当时这个反动集团中有人向党彙报了內幕情况，他們的陰謀敗露，企圖破產了。可是，他們并沒从此罢手。李荏、苏金伞召集了这个集团成員的秘密會議，強調他們的“精誠團結”，共同反党。

“三反”后，李荏調到中南，苏金伞便成为这个集团在河南的头目，他对他的集团中人說：“以后要樹立我的威信，”要他們的人处处为他捧場、吹噓，他們之間要相互吹捧，如狂妄地說：“詩的王國在河南”、“苏金伞等是全國有数的詩人”、“樂星、錢繼揚是文藝理論家”、“錢繼揚是河南的別林斯基”等等。听起来使人肉麻。

在省第一次文代会上，苏金伞断章取义地摘引了某些文藝領導人的話句，采用似是而非的、轉弯抹角的手法，偷偷販運了胡風的“为藝術而藝術”、“到处皆生活”的反动的文藝思想。他对当时省委宣傳部組

織的对他报告中反动的文藝观点的批判，表面接受，背地里心怀不滿，繼續反对党的方針政策。苏金伞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中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說法，是不讓作家大胆地在藝術上追求，是用政治的套子套作家，是提倡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一切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便由此而來。苏金伞和他的右派集团中的成員宣揚：“教条主义的所以產生”，不是因为文藝作者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羣众的結果，而是因为“強調了文藝为政治服务，也就是強調了政治忽視了藝術特質的結果”。因此，中國和苏联的作品，都“今不如昔”。照他們說來，只有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作品，才能流傳后世；那些为工農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品，倒反成了“粗糙”、“膚淺”、“曇花一現”的东西。他們極力吹毛求疵以貶低“不能走那條路”小說的作用，当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們的这种反动的文藝观点的反映。在討論关于詩歌問題的會議上，苏金伞明目張胆地反对了民族形式，反对民歌快板。在鄭州市詩歌座談会上，他更露骨地提出：“詩是神的啓示”，要詩作者的“感情不能是一般人的”，“要大胆的想像”，“自己要走自己的路”，“別人不能看見的、不能感覺到的，你看見了，感覺到了，一寫出來，別人都說‘好’，这才是‘宝’”；否則，“人家說牡丹是紅的，你也說牡丹是紅的，就是平凡”。甚至他还說过：“夢中得詩”、“为政治服务的都不是詩”。他这样引導青年去“霧中求宝”，脱离当前的火热的斗争，我們能承認他是“超階級”、“超政治”的嗎？不，絕不是这样。他是“指示”青年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去为資產階級少数人的政治服务，这是很顯然的。

在肅反运动中，这个集团中的主要成員的政治歷史和活动，都受到了審查，对頑抗的進行了說理的斗争。弄清楚了他們的歷史，得出了結論，給他們以寬大处理，并安置了适宜于他們改造和發揮才能的工作崗位，他們本应回心向善、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了，本应誠心誠意地接受改造了，但是事实并不然。这个集团的成員，並沒有認真地去清算“与胡風不謀而合”的反动思想，並沒有拆散这个集团和停止他們的活動，反而他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心更加增大了，他們相互勾結得更加緊密了，反动活动也更加加多了。不过这一时期他們采取了更隱蔽的方法而已。他們極力籠絡对党不滿的人，私房密語說

“肅反搞錯了”，挑起这些人对党的仇恨情緒，順手拉入他們的集团，一同向党進攻。他們对于有嚴重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居功自傲的人，以吹捧和名利誘之，引之上右派之鈎，共同反党。有一些人竟这样作了他們的俘虜。改“河南文藝”为“奔流”之后，他們極力把“奔流”办成为脫离省文联机关和党的領導的“同仁刊物”，主張取消編委，自由招考編輯人員，追求大型和全國性，片面強調作品的藝術性，提倡寫“揭露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提出“跳高竿”的問題，排斥河南青年作者的作品。在錢繼揚傳達全國編輯工作會議精神之后，在“奔流”上連續寫了兩篇“編者的話”，不提为工農兵服务，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強調要發表批評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为在“奔流”上大量放出“毒草”制造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企圖以此把河南的青年作者与讀者引上反党的道路。在青年創作會議上，苏金伞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散布了一系列的毒害青年的反动論点。說什么“只要从革命發展中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即掌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义”；“不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創造典型人物”，“参加合作社，有时中農比貧農还積極，資本家还有的敲鑼打鼓欢迎社会主义改造”；“正、反面人物沒有固定的标准……若是以品質來衡量，那末落后的人也許很純正”；“打破框子”，“从生活出發”，“大胆干預生活”，“文藝自由，注意風格和流派”，等等。苏金伞出席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回來后，对“鬧事”最感兴趣；对陈其通的批評，他很高兴，說他老早就有这个意見，証明他的見解高明；強調“香花”“毒草”难分难解，“‘草木篇’放一百篇也不多”；傳播小組会上馮雪峰說的“打倒一切清規戒律”，老舍要寫悲劇“把人寫死”，造謠說“××受批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討論”，等等。苏金伞集团，为了完全擺脫党的領導，把文联党支部控制在自己領導之下，可以为所欲为，他們就極力爭取入党，散布苏金伞“有职无权”的空气，要省文联党组织离开省文化局党分組的領導，制造对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和×××同志不滿的輿論，說“河南剧改沒改出好剧本，刘胡蘭禁演，几乎使×××發瘋”，在人事問題上，說“文化局要搞‘清一色’×××宗派主义”，在“奔流”問題上，說“过去讓×××審稿，登文化馆、站总结，以后不登这些”，对×攻击，說×不懂文藝，稿子也不再讓×看，抓住省文联不能在行政区盖樓問題，煽动文联党內外羣众一致

对×不滿的情緒，降低×在省文联的威信，使他不能再对省文联的工作插手。

从上述右派集团在肅反以來的种种謬論和活动來看，他們从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已作了向党、向社会主义文藝大举進攻的准备，这些都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發，只是等待他們的“时机”的到來而已。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評，匈牙利事件的發生，“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提出，党進行整風运动的宣布等等，他們認為他們的“时机”已經到來了，于是他們便对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道路，發動了極為猖狂的、極為狠毒的進攻。这个，因為他們事先有醞釀，并不因苏金傘的去蒙古而有所減弱。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們把長期准备的毒箭一齐放出來了。党内右派分子欒星作了这个集团向党進攻的急先鋒，提出“四不心服”，污蔑馬克思主义成为“官学”必然產生教条主义，詆毀党压制鳴放；錢繼揚等積極組織“毒草”在“奔流”上發表，企圖挑起廣大作者、讀者和工農羣众的对党的不滿情緒，至六期、七期已达登峯造極的程度。特別是六期，有計劃地、集中地發表了許多“毒草”，攻击了党和省文化局的領導，宣傳了修正主义，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錢繼揚拟了四个选题，在編輯部內分攤任务：錢繼揚寫了“解除思想上的禁令”，放在一組雜文的头一篇。这一期的詩中有李白鳳的“春天，花朶的春天”，有着明顯的挑撥性，是要煽起人們对党的不滿情緒的，甚至要煽起工人罢工。这一期的三篇小說都是毒草。李文元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反对人民民主專政，为地主階級張目的小說，這篇小說，是經過錢繼揚的“啓示”修改成的。方展（即張鄉朴）的“雷村風云”，是煽惑農民“鬧事”的小說。徐慎的“光滑的銀絲”，歪曲丑化了較老干部的形象。另外，在这一期雜文里，他們还發表了欒星（党内右派分子）的“但願平等辯理而已”、李文元的“从套子中走出來”、何南丁（黨員）的“‘糊塗塗’、‘常有理’、‘惹不起’”、趙青勃的“春天斷想”等雜文，都是所謂配合鳴放的毒草。过去“奔流”为右派集团所把持，办得如此臭气四揚，于是蒼蠅、蚊子便聞風而來，流沙河的“火中孤雁”及李索开为流沙河鳴冤的文章，都已送到編輯部，对四川的党委作了惡毒的攻击。后因流沙河又用急信要回，未得發表。在此期間，王大海去紹興，未得參